

金圣叹评改本

施耐庵 原著

金圣叹 评改

张国光 校订、整理

(上)

水浒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



封面设计 / 刘卉

(上)

ISBN 7-5609-1683-X



9 787560 916835 >
定价: 45.00元 (含上下两册)



金圣叹评改本

施耐庵 原著

金圣叹 评改

张国光 校订、整理

(下)

水浒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 / 刘卉

(下)

ISBN 7-5609-1683-X



9 787560 916835 >

定价: 45.00元 (含上下两册)



施耐庵
金圣叹

原著
评改

校订
整理

金瓶梅評改本 水滸

周子題



(上)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

施耐庵
金圣叹
张国光

原著
评改
校订

整理

金瓶梅評改本

水滸

周子題



(下)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

(鄂)新登字第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圣叹评改本 水浒(共二册)/(明)施耐庵原著;
(清)金圣叹评改; 张国光校订、整理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

ISBN 7-5609-1683-x

I. 水…

Ⅱ. ①施…②金…③张…

Ⅲ. ①古典小说-中国-明代②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③长篇小说-中国-明代

Ⅳ. I 242.4

金圣叹评改本 水浒

(共二册)

(明)施耐庵 原著

(清)金圣叹 评改

张国光 校订、整理

责任编辑 李富轩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4 插页: 6 字数: 700 000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609-1683-x/I·66

全套定价: 45.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发行科调换)

前 言

“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

——金圣叹

—

在中华民族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水浒》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卓立千古的不朽之作。

《水浒》是中国唯一的也是世界上不多见的以描写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史诗式的古典现实主义伟著。它像一道耀目的闪电，划破了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给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群众以很大的鼓舞。

《水浒》用通俗、准确、精炼而又形象化的语言，揭露了“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的社会不平；通过“农夫当午在田，皮焦汗滴，彼公子王孙深居水殿，犹令人展扇摇风”的阶级对立现象，激发劳动者的觉悟。它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展示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被腐朽反动的官僚集团逼上梁山的曲折过程，热情歌颂了同黑暗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精神。

《水浒》运用绘影绘声的语言，给读者讲说了一批英雄人物的传奇：大闹野猪林，风雪山神庙，智取生辰纲，血溅鸳鸯楼，双越狱，大劫牢，三打祝家庄，大破连环马，月夜赚关胜，雪天擒索超，兵打北京城，智取大名府这样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真是“说时寒气侵肌冷，讲处悲风透骨寒”。

《水浒》以细致、深刻的笔触，大胆地为来自社会底层或

从统治阶级排挤出来的一批人物树碑立传，并让他们占据舞台中心。它热情歌颂这些“仗义英雄”、“擎天好汉”、“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的丰功伟绩。它塑造的梁山英雄群像，“各有其胸襟，各有其心地，各有其形状，各有其装束”，不愧称为“面面峥嵘”、“心心皎洁”、“云质龙章”、“日姿月采”。因此他们能够永远活在读者心目中。

《水浒》不单纯是赞美侠义之士“双拳起处云雷吼，飞脚来时风雨惊”的个人反抗行为，而是有意识地描写被压迫者通过不同的道路汇聚到梁山泊，在此建立根据地、组织了革命政权的空前壮举。“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儿洼内聚蛟龙”，显示了这个根据地是不可战胜的。“农夫背上添心号，渔夫舟中插认旗”，更说明起义的基本的力量是广大的劳动群众。

“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这一十分激动人心的口号，可以视为《水浒》的主题歌。几百年来，这部小说正是用这样的爱憎分明、情感炽烈的语言，深深震撼着广大的进步读者的心灵，推动他们走向团结和斗争。《水浒》对于我国近几百年的农民起义，对于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都有着积极的影响，这一点是任何人抹煞不了的。因此要重复一句：“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古代批评家评论得多么好啊！《水浒》的确不仅是现实主义的杰作，而且也是浪漫主义的高峰！

《水浒》在我国白话文学发展史上，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我国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白话文学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有了《水浒》，我国才有了第一部成功的长篇白话小说，而《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遂继之而起。到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也举《水浒》、《红楼梦》的语言为范例。可见这部小说对我国的新文学运动有深远影响。

以上是我于1981年为《水浒》丛刊——《水浒争鸣》撰写的卷头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一系列对《水浒》的评赞之词，乃是针对从17世纪40年代以来广泛流行的《水浒》的定本，即由金圣叹（1608—1661）于1641年完成批改并出版的七十回本《水浒》而作的，它并不适用于在此以前的、最早出版于嘉靖初年的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和万历中年据此加以扩充的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我认为，这种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均应称之为“旧本”，而七十回本才是公认的《水浒》的最后定本或标准本。

《水浒》不同于一般的古典的小说，它并不是一个作者一次完成后就定型了的作品，也不是志同道合的几个作者合作的产物。可以说：许多不同时、地的民间艺人和封建文士都参与了它的创作过程。尤其特别的是：在它的成书和印行以后，竟出现了一种偷换了主题、改变了主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新版本，而这种根本与原作背道而驰的新版本，竟代替了原本并冒用原作者的名义广泛流传。假古本打倒了真古本，并且比真古本更受欢迎，这就是《水浒》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

多年来笔者研究了《水浒》的演变过程和有关问题，分析了历来对《水浒》的各种议论；根据具体事物应作出具体分析的原则，对于《水浒》提出了与流行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截然相反的看法，我把它概括为两句话：“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这就是反对脱离历史实际的、形而上学的、人云亦云的研究方法；而主张应在比较系统地、周密地研究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研究《水浒》及其中的主要人

物。我认为：不能单从形式上分《水浒》为简本、繁本两个系统，而应按其主题思想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以《全传》本为代表的包括它以前的一切本子，无论是最早出现的郭勋本（繁本）也好，或是至今保存下来的《忠义水浒传评林》（简本）也好，它们的特征是：都离不开用封建的“忠义”观点作为书名，并且都写了宋江投降后镇压方腊义军直到“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的过程，这种本子就很不同于被金圣叹删去了“忠义”标题，斩截了七十一回以后文字并消除了前文中投降主义色彩的七十回本。前者可称为“旧本”（或原本），后者应简称“金本”（称“金批本”也不确切，因金圣叹不仅批了，还砍了、改了此书也）。

根据《水浒》流变史的研究，我认为这部小说是由一位通俗文学家（鲁迅说：“施耐庵”是他的托名）参考了《宣和遗事》等等文献资料，并在借鉴了许多无名的民间艺人的创作和元代与明前期水游戏的基础上撰写成书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水浒》本子，乃是嘉靖初出版的百回繁本《忠义水浒传》，这可以说是它的祖本；而明万历中出现的插增打王庆、田虎故事的一百二十回繁本《忠义水浒全传》，则是它的恶性膨胀。

历史上的宋江，本来是个投降派，正因此才被封建文人选为艺术作品的模特儿并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而“全传本”的宋江这个形象则更被充分典型化了。他被塑造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封建王朝的基层骨干，他从来没有想到要背叛本阶级，而是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才上梁山的。但他的上山并非要参加起义，而是一贯地大肆污蔑起义军。一朝大权在手，他以为“莫予毒也已”，便有计划地从上而下地掀起投降活动的高潮。而受招安后，宋江更是感激“皇恩浩荡”，力图

报效；竟把十万起义大军变质为反革命专政的工具，而亲自率领这批人马，北剿田、王，南征方腊。这样，大叛徒宋江遂又成为了反动王朝赖以屠杀数十万起义者和无辜人民的刽子手。他时时恪守王朝法度，口口祝颂天子圣明，立誓：“宁可朝廷负我，我衷心不负朝廷，至死不改！”有的奸臣不大理解这个宋江的耿耿忠心，尤其是妒忌他的得宠，因此最后用毒酒谋害了他。但他服毒酒后，却没有半句怨言，反而耽心自己死后“反心兀自未除”的李逵会起来造反，于是竟丧心病狂地把李逵骗来亲手鸩杀之，怕为革命留下半粒种子。

围绕着这个投降主义者宋江的形象，作者又把一百零七位头领丑化为叛徒群像，说他们都是俯首帖耳，任人出卖而无异词。即使一向被认为反抗性最强、叱咤雷鸣的人物，如李逵、鲁达、武松等，虽然明明不同意宋江的投降主义政治路线，但却不得不惟宋江之命是听，而盲目屈从于他的反动组织路线，从而无一例外地都做了宋江的驯服工具。这些梁山泊好汉被出卖后还充当了王朝的爪牙、宋江的帮凶，甚至愈是原来富有革命造反精神的农民军头领，而后来在屠杀起义军时也变得愈为凶恶。像李逵这样对封建皇帝较少幻想、有较为明确的革命思想的好汉，也变成屠杀起义军的大刽子手；而在最后服了宋江杀害他的毒酒时，却说道：“罢了！生时服侍哥哥，死后仍做哥哥帐下一名小鬼！”

作者既然要美化投降派，他必然要仇视真正的革命派；因此盛称投降派宋江生时封官衣锦，死后庙祀千秋，名垂青史；而咒骂方腊、王庆、田虎及其骨干，则是什么“恶人榜样，个个陨首戕身”，并被凌迟处死，诛灭三族。其目的就是要使革命人民看了方腊“当刑受劓”的描写，不寒而慄，从而得出投降既“光荣”也是义军最好的出路的结论。这种忠义《水

浒》，虽然在艺术上有不容否认的优点，然而它正是利用这种艺术的糖衣，包裹着毒药来腐蚀人民斗志的。明代后期的农民军首领可考者，大部分都是做了叛徒或逃兵，显然这种忠义《水浒》对他们是起了严重的腐蚀作用。明陕西巡抚孙传庭奏报他在陕西数年“剿抚并用”，“荡平”了“十载不结之大寇”。过细一查，除了闯王高迎祥等两三人是英勇就义的以外，其余都做了可耻的叛徒，说明孙传庭用招抚政策瓦解义军，比他单纯用武力“有效”得多。

崇祯十一年（1638年）是明末农民战争降到低潮的一年，这主要是因为刘国能的“奉母命”投降，引起了连锁反应。连张献忠、罗汝才也在并非不能一战的情况下主动“求抚”。投降主义浪潮席卷楚、豫、秦三省。高迎祥余部和与李自成并肩作战的部众，也纷纷投降了。李自成独力支撑，孤掌难鸣，也几乎全军覆没。而张献忠等降后则成为了所谓“釜鱼阱兽”，随时有被明郧阳巡抚、湖广巡抚，特别是反动军阀左良玉消灭的危险。次年张献忠等虽重整旗鼓，但旋被杨嗣昌、左良玉打败，困在巴巫山中。而杨嗣昌则续用招抚政策，诱降除张献忠以外的农民军首领。随罗汝才入川的义军九家，到崇祯十三年，“其八相继俱降矣”，而罗汝才也在动摇中。这说明，投降思潮是当时农民军的主要危险。而“唯以招安为心”的忠义《水浒》正适合了反动统治者的需要。明神宗爱读这种《水浒》，明都察院还刊刻它；李贽也说：“有国者不可以不读《水浒》”；可见原作者正是要用其中的宋江作榜样，诱骗义军首领投降做王朝鹰犬。

笔者认为：忠义《水浒》是由许多各自独立的、大大小小的有关起义的故事汇合起来的，因此它的前七十回中的某些对起义首领的叛逆形象的刻画，还是符合现实主义的。但

总的说来，这样的刻画却是服从于“始于剧盗，终于忠义”这一最中心之主题的，是给叛徒宋江的形象起铺垫作用的。因此任何有反抗性的人物形象在原本中都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忠义水浒全传》只能是一部主题思想很不健康的艺术作品。

三

在忠义《水浒》的最具代表性的本子——“全传本”流行了二三十年以后，当明末农民起义已历时千载却出现了投降主义思潮泛滥的时期，幸而在苏州府这个东南最大的手工业、商业城市和文化出版业的中心，出现了一个主要以靠教蒙馆为生而思想异常锐敏的穷秀才金圣叹。他痛斥崇祯帝“纵不可限之虎狼”鱼肉人民，“而欲民之不叛，国之不亡，胡可得耶？”笔者通过研究金圣叹的全书和全人，一向认为他是向往农民革命的（详见拙著《水浒与金圣叹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1年；暨《金圣叹学创论》，版同上，1993年），为了遏止忠义《水浒》对农民军的腐蚀作用，鼓舞起义军坚持斗争而不要中反动派令两虎相斗，致一死一伤之计，他于是煞费苦心地着手对《忠心水浒全传》加以批改，力图把这部“反面教材”修改为革命教本。

金圣叹批改《水浒》的贡献是：

（一）删去书名中的“忠义”标签

原本强调“忠义而《水浒》也，《水浒》而忠义也”，两者不可分割。但金圣叹径称此书为《水浒传》，而否认“忠义”是书名，他还以己见解释“水浒”一词的含义是说梁山泊为农民军占领的割据区，故云一百八人“殆不止于居海避纣之志”。顾名思义，金本《水浒》，就不再是鼓吹忠君的书，

而是农民战争的颂歌了。

(二) 从结构上论证《水浒》只应止于排座次

金圣叹强调：《水浒》“叙一百八人而终之皇甫相马”；复批：“这里方是梁山泊大聚义处”句云：“一百八人以一句总收之，笔力奇绝！”他又在第七十回回首总批云：此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这说明他砍去“全传本”的后四十九回，实是为了消除其投降主义毒素，因此他说：“夫江等之终皆不免于窜聚水泊者，有迫之必入水泊者也。”他解释宋江、武松望招安的话，是为了表达“彼江等一百八人皆有大不得已之心，而不必其后文之必应之也”。为此他痛骂：“乃后之手闲面厚之徒，无端便因此等文字，遽续一部唐突才子；人之无良，于斯极矣！”这是对一切鼓吹宋江投降打方腊的旧本《水浒》的谴责，读了真是大快人心！

(三) 强调《水浒》的主题是“逼上梁山”，既反贪官，又反皇帝

旧本确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作，故处处歌颂宋徽宗“至圣至明”。宋江把高俅捉到山寨时，还请他在正面而坐，纳头便拜。可见他们之间的斗争只是地主阶级在朝派与在野派（不应说什么“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但金本则把高俅作为最黑暗的政治势力加以鞭挞，认为高俅是一座反动的政治宝塔上具有支配作用的罪魁：“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而每一殷直阁者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乎哉？”

金圣叹把旧本第一回“误走妖魔”截去置于书前作为《楔子》，说这不算是第一回，乃是说书人的开场白，与正文无关。他以高俅发迹的事作为第一回，这就否认农民革命是

什么杀星下凡扰乱乾坤，从而突出了他们的起义是被“逼上梁山”的主题。金圣叹痛骂：“当时朝廷无人不如高俅！”但他并没有放松对高俅的后台的深刻揭露，所以又把七十回本开卷一句改为“哲宗皇帝在位……东京……便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这个“便”字说明了皇帝和高俅是派生关系。复批云：“言子弟则有为之父兄者矣。失教之罪，谁实任之？”又说：“夫江等之终皆不免于窜聚水泊者，有迫之必入水泊者也。”究竟是谁迫害他们？金圣叹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这就是把矛头指向了宋徽宗，并暗讥崇祯皇帝。

（四）突出了晁盖在小说中的地位

按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宣和遗事》，“三十六将”中都有“铁天王晁盖”。但“全传本”第七十一回的四六文中却说：“昔晁盖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这就是说晁盖的称“天王”，说明了他是有反抗天子的“政治野心”的，故必须把他排斥掉而以那个仅敢自称“保义郎”、自居于武官之末的“忠心不反朝廷”的宋江为一百零八人之首。所以这种本子在“归天及早”句旁批云：“更奇妙！”（据袁无涯刊本《忠义水浒全书》）百回本又批宋江宣布“聚义厅今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这一字之改，正是宋江推行投降路线的标志。但金本却把晁盖推尊到一百零八人之上，这是因为：金本仅七十回，晁盖死时全书已近尾声，他的地位无形中就变得十分重要了。金圣叹反复强调：“梁山泊，晁盖之业也”，而宋江只不过是“承晁盖之业”；还说：“一部书共计七十回，前后凡叙一百八人，而晁盖则其提纲挈领之人。”并附会说：“北斗七星者，众星之所环拱也，晁盖为此泊之杓，于斯验矣。”

他并谓：“此书始于石碣，终于石碣……，必以中间石碣为提纲，此撞筹之旨也。”又强调：《水浒》的主题是鼓吹农民起义，而不只是为宋江一人作传：“一部书将网罗一百八人而贮之山泊也。”“聚一百八人于水浒而其书以终”。读者相信了这些话，读《水浒》至一百八人齐上了梁山时就自然认为此书至此已终，就不要再看宋江投降的故事了。

金本中虽保存了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情节，但金圣叹却从“堂”字着眼，硬说命名所住处为堂，这就意味着另建了政权。旧本写忠义堂前的朱红牌上“各有金书七个字，道是：常怀贞烈常忠义……”金圣叹却把这一联语删了。又把自称“猥鄙小吏”的宋江带头立的“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的投降主义誓言，也改为宋江为首的一百八人均自称“义士”；又代他们撰了革命的誓词云：“一日之声气既孚，终身之肝胆无二。倘有存心不仁，削绝大义，外是内非，有始无终者，……刀剑斩其身，雷霆灭其迹。”可见金本的“忠”已改为忠于起义斗争；“义”已改为革命的义气了。清朝前期根据金圣叹拟的誓词中“拜天地为父母”一语组织起来的“天地会”及其派生的农民秘密组织，也都用了“忠义堂”这个名号，可见金本《水浒》中的“忠义堂”已有了新的含意。

（五）彻底改造了忠义《水浒》中的宋江形象

金本不仅文字较为洗练，故事较为集中，回目大为减少，而且它的主题、思想内容（除附加的“惊噩梦”这条硬嵌上去的尾巴和某些反动序文、批语和某种改坏了的文句以外）、故事情节，都起了质的变化。尤其是宋江的形象经过了金圣叹大力修订，使之顿改旧观。原本中宋江的三次掀起投降高潮，全面出卖革命事业，又镇压了三批农民起义军和多次破